

后记

1990年我从中山大学考古学专业本科毕业，之后一直在广西从事考古工作，一晃就是28年。得益于某个机遇，自2002年起，我能较多专注于合浦汉代遗存的发掘和海上丝绸之路合浦港的课题研究。这么多年来，虽说取得了些许成果，在学界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同，但我始终惴惴小心，如临于谷。因为相对于微不足道的成绩，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更多、更艰巨。我能做的，唯有不断地敦促自己，问道于考古。

2012年，在之前单位及自治区文化厅相关课题成果的基础上，我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合浦港的考古学研究”，获准立项，并于2018年1月结项，成果鉴定等级为“良好”。本书既是结项成果，更是我长年在合浦发掘和思考的小结。课题开展期间，我先后赴西南、西北数省区实地考察，到泰国、法国等地的遗址和博物馆参观，还通过与国内外学者的交流，补充了不少东南亚、南亚沿线国家及陆上丝绸之路考古的新资料，试图把合浦港作为重要节点切入到范围相对较大的中西交流网络加以研究，对汉代海上丝绸之路这段辉煌历史的概貌做出初步复原，但结果却不尽如人意。盖因汉代海上丝绸之路作为一个线性文物，在如何打破国界与语言的壁垒上，确实存在很大的难度，虽竭尽全力，亦难穷其究竟。特别是珠饰，风格的模仿仅是文化互动和交流的一方面，更可靠的证据或来自技术，若不借助多学科交叉研究，仅单纯依靠类型学建立其时空分布模式，探讨其来源就显得相当困难。因此，许多学术问题，只能留待今后深入。

蕞尔小文，汇集了学界前辈和同仁们的热心帮助以及相关单位的大力支持。我的博士生导师霍巍教授倾注心血、奖掖栽培自不必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白云翔研究员也给予了悉心指导。中国科学院上海精密光学机械研究所李青会博士一直与笔者分享最新的研究资料和测试分析结果，并进行诸多有益的讨论；比利时学者米夏（Michele H.S.）博士，翻译了本书的英文提要。合浦港考古工作开展以来，国家文物局、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厅、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局、厦门大学历史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北海市人民政府、合浦县人民政府以及国内外多家文博机构给予了大力支持。四川大学李映福教授、罗二虎教授、白彬教授、赵德云教授和吕红亮教授，中山大学郑君雷教授和林英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吴焯研究员，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朱海滨教授，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特藏部林锐研究馆员，广州文物考古研究院闫晓青研究馆员，广西民族大学富霞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仝涛博士、杨勇博士，德国考古研究院雷安迪（Andreas Reinecke）博士，印度卡拉拉邦历史研究理事会会长兼Pattanam港口遗址发掘领队P. J. Cherian，泰国因陀般若佛学档案馆基金会主席Bunchar Pongpanich，合浦县博物馆韩云鸽女士，文物出版社杨新改女士，宁波中国港口博物馆毕显忠先生，同门的索德浩、李帅、韦莉果，广西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心李世佳、严焕香、沈婧，以及许多在此难以一一列举的师长、同行和朋友，在我查找资料和撰写、修改书稿的过程中，都提供了慷慨的帮助。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的领导及我的诸多同事，也给予了不少工作上的便利。在此，一并致以最衷心的感谢。文中照片，除特别注明外，均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党春宁拍摄或由广西文物信息中心、合浦县博物馆提供。

以史为鉴，方知兴替。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考古学研究，现实意义也很重大。2013年中国政府提出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无疑是对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传承和提升，两者之间有着必然的内在逻辑联系，而考古学以实证形式阐述中国与东南亚、南亚、西亚等地区之间的传统交往和友谊，是加强“一带一路”理论研究和话语体系建设的一种软力量，在为沿线国家架设起“民心相通”桥梁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学科优势。具体到广西，中央赋予广西构建起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西南中南地区开放发展新的战略支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的“三大定位”，对于身处这一伟大时代的建设者而言，回望历史，镜鉴今日，必将为北部湾地区的发展迎来新的更大的机遇。时势使然，我们也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来关注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凝心聚力，从而把该项研究引向深入。

囿于学识和时间，力有不逮。故本书的未竟之言，错漏之处，恳请方家谅解并予以指正。